



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与其修养方法

The Interpretation of Courage and Its Cultivation in Analects

陈芋媚

TAN YEE MEI

17ALB00249

拉曼大学中文系

荣誉学位论文

**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
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
THE BACHELOR OF ARTS (HONS) CHINESE STUDIES
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
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**

DECEMBER 2019

目次

宣誓	ii
摘要	iii
致谢	iv
一、绪论	1
(一) 研究意义	1
(二) 文献综述	2
(三) 研究方法	6
二、“勇”的基础与类别	7
(一) “勇”的基础	8
(二) 礼义之勇	10
(三) 中道之勇	12
(四) 无德之勇	15
三、“勇”的修养方法	17
(一) 好学	18
(二) 力行	20
(三) 内省	21

(四) 改过.....23

四、结论.....26

引用书目.....28

宣誓

谨此宣誓：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，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，无论是书面，电子或口述材料，皆已注明具体出处，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。

姓名：陈芋媚 TAN YEE MEI

学号：17ALB00249

日期：2019年10月17日

论文名称：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与其修养方法

学生名字：陈芋媚

指导教师：叶秀清师/博士

校院系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

摘要

孔子是很早就将“勇”作为道德德性之一的人，而先秦儒家“三达德”中就有包括“勇”。根据《论语》中孔子的论述，“勇”代表了勇敢、无惧，我们根据它与“义”之间的关系可以间接得知，“勇”的基础就是“仁”。此外，“义”又与“礼”有密切关系，因此“勇”也与“礼”有关，它需要受到“礼”的约束，否则就会出现“乱”的现象。在受到“礼”的约束的同时，“勇”的表现也需要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勇德，这是因中道可以协助掌握当“礼”约束“勇”时所应具备的分寸。为了能将孔子提倡的“勇”实践在生活上，因而需要将勇德好好修炼，其中本文以 PDCA 循环为基础，从而提出“勇”的修养方法：好学、力行、内省和改过。由于现今报章出现许多令人唏嘘的事件，因此希望可通过对德行之一的“勇”的探讨，发挥其在生活上的实用性，让社会能变得更加和谐安定。

【关键词】 勇、仁、义、礼、中庸、《论语》

致谢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一眨眼三年在大学的时光就要过去，很快又要迎接毕业的到来，逐渐迈向社会前进。有人说大学是小型的社会，在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事情，对我来说确实如此，正是因为有身边许多人的关怀与帮助，让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，变成了一个如今有理想、有责任心和懂得感恩的人。

首先要感谢叶秀清老师对我的指导与鼓励，从开题报告到整篇论文，从写作提纲，到不厌其烦地修改内容，老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，使我的论文变得更加完善。叶秀清老师知识渊博，对四书的内容可说是背的滚瓜烂熟，且对其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，正是如此让我觉得受益匪浅，促使自己觉得应该要向老师学习。在此，向叶秀清老师致以由衷的感谢。此外，还要感谢我的父母，正是他们对我的无限关爱与包容，让我在学习的道路上可以专注自己的学业，而不必为其他事情烦恼。于此同时，也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同学和朋友，三年一起上课学习的日子，让我们彼此因为互相交流、讨论，而学了许多宝贵的知识。

最后，还要感谢所有的任课老师，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评阅我的论文，敬请各位老师、专家批评指正。

一、绪论

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等都是从前到现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，但“勇”却很少学者研究，它的研究空间还很广，因此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就作为了这份研究报告的对象。此外，笔者也希望通过撰写这篇论文，让自己在“勇”的表现中可以变得越来越精进，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的个人修养变得越来越好，因而最终选择了以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研究主题。

（一） 研究意义

《论语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，一直广受人们的阅读甚至作为研究对象。《论语》中主要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，并且较为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道德观、伦理思想及教育原则等。目前学术界中只针对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研究对象的属非常少数，笔者根据 CNKI 的网站所找到的相关论文只有 9 篇。其余学者更多的是研究《论语》中的礼乐制度，或是通过《论语》来探讨孔子的教育原则，甚至研究《论语》中的核心思想：仁。

以上是笔者目前在学术界中所看到的情况，因而触发了笔者决定将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研究对象。笔者以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是若是将范围扩大成儒家思想，或是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与《荀子》三者相提并论，这会无法更好且更深入地叙述与探讨究竟儒家的奠基者——孔子所提出的“勇”它的内涵是什么，因而决定将范围缩小为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勇”。此外，

因为在学术界的近十年来才开始有更多的学者研究“勇德”，笔者认为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的研究空间，因此希望可以借助前人的研究来进一步分析与阐述个人观点，使更多学者能提出更好的观点或看法，在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勇德”中能越来越好。

除了因为这研究对象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外，另一因素是笔者希望可以通过探讨《论语》中“勇”的类别与内涵来增进自己。笔者总是认为自己缺乏了勇气，因而常常容易错失机会，但机会只有一次，一旦错失了得来的只有后悔。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因而希望可以通过探讨“勇”，学习圣人在“勇”这方面的精神，让自己对“勇”更加了解，培养自己的“勇德”并且让自己更精进。大家都习惯将“勇”字与“不惧”、“勇敢”、“勇气”相联系，但“勇”不应该只是包涵了勇气或勇敢而已。所谓“己立立人，已达达人”，因此希望通过这几道问题：“‘勇’是什么？‘勇’与‘勇德’的差别在哪里？如何学习修养‘勇’的精神？”来让自己对“勇”更了解，并且使自己与身边的人更加进步，德行也越改越好。

（二） 文献综述

在中国思想史上，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最早将“勇”作为德行之一，并加以提倡和论证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就有将“勇”与“义”、“仁”、“礼”相联系，例如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、“勇者不必有仁”、“勇而无礼则乱”等。虽然现今学术界也开始出现许多关于“勇”的研究，但与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等道德规范的研究相比，学术界对于“勇”的关注的确较为少见。

对于“勇”的探讨，学者们大致都认为“勇”必须建立在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

之下，否则就不是真正的“勇”。其中黄建跃在《“好勇过义”——兼论〈论语〉中的“勇”及其限度》就认为孔子在论“勇”时应分为“积极的勇”及“消极的勇”。

“积极的勇”是指“勇”是君子不可或缺的德行之一，其具体内容即“不惧”。因为“勇”居于三达德之一，由此看出其重要性。黄建跃也认为因孔子力图将“勇”给予限制，若缺乏“礼”、“义”的制约，就会出现“乱”的后果，因而将此“勇”归类为“消极的勇”。

学者们在分析“勇”的内涵时，各自有不同的看法。刘彤的《析〈论语〉、〈孟子〉中的“勇”的内涵》与曹圆杰的《〈论语〉中的“勇”字的用法考察》都有相似的看法，他们都认为“勇”的内涵中具有“匹夫之勇”、“血气之勇”、“无谋之勇”，而这三种“勇”都不能算是真正的“勇”，这些只能算是“小勇”。“勇”需要建立在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的制约之下才能算是真正的“勇”，也就是“大勇”。曹圆杰甚至认为“勇”的内涵中也具有了“理性之勇”，也就是为公义而努力的“勇”。潘小慧在《儒家哲学中的“勇德”思想》与涂可国的《儒家勇论与血性人格》都认为“勇”具有不同的形态，其中可分为三种即勇力、勇气及勇德。他们强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表现出了“勇德”为贵、“勇气”次之和“勇力”为轻的三重意涵。勇力体现在主体内在的忍耐力与对外的抗击力，也就是主体的举止；勇气是对外在的危险或困难等不感到畏惧，且也“不动心”；勇德则是必须符合“义”、“礼”且好学之“勇”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“勇”。虽然潘小慧与涂可国认为“勇”有不同形态，但实际上“勇力”与“勇气”可算是前文提到的“小勇”，而“勇德”则可归类为“大勇”。

潘小慧认为“勇”的特性可分为不惧、知耻与耐力这三种，拥有知耻因而能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，而“知耻近乎勇”；勇也具有百折不挠与愈挫愈勇的表现，

而这看出了“勇”具有耐力的特性。涂可国根据潘小慧给予的论点，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“勇”的特质反而应该分为不惧、敢为与中道才对。涂可国觉得勇而不惧表现在两方面，也就是不惧外在环境与自身内在所处的危险、痛苦或困难；勇而不惧只停留在精神层面是不够的，而是应该付与行动，因此就必须敢作敢为；过犹不及都不算勇，反而会懦弱和鲁莽，因此只有做到“中道”才符合伦理理性。

除了探讨“勇”的内涵之外，也有学者提出了“勇”的修养方法，那就是“知耻”。所谓“知耻近乎勇”，冯婕在《〈论语〉君子三达德思想研究》中认为以“义”为质，也就是不只有“勇”，也必须要有“仁义之心”，还有就是要以“礼”来制约“勇”，就可以达到“知耻”。李振纲《〈论语〉中的“勇”与子路“好勇”》则认为君子之“勇”除了与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仁”相关之外，也必须体现在知此“耻”字上，因为“知耻”，故君子在言行上从不苟且。吴兵兵在《先秦儒家三达德研究》中也提出“勇德”的实践方式就是“知耻”，因为作者认为只有“知耻”，才能建立正确的观念，从中认识自己的过错。尹春光的《先秦儒家勇德研究》叙述了孔子的其中三位弟子——颜回、子路、子夏如何实践“勇”，以及他们的“勇”实践的途径。颜回的“勇”体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正义的坚持；子路的“勇”表现为敢于行动的能力，但这不是完善的德性；子夏的性格与子路相似，性格爽朗，做事勇敢，但子夏的“勇”表现在不畏惧大国君主和不受其侮辱的精神上，他也注重“礼”与“勇”的融合。

由于笔者能力有限，所以在收集有关着重探讨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这方面的书籍中，只找了19本书籍，其中有8本是专书，11本是论文集，但在专书中找不到只探讨“勇”的课题的书籍；在这19本书籍中就有11本书在讨论“仁”的

思想，其他的则较多在探讨“义”与“礼”。这 11 本论文集中，只有一篇论文是主要在探讨《论语》中的勇，也就是陈立胜的《〈论语〉中的勇——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》。这些书籍是从 1963 年一直到 2015 年，但从以上数据可看出，学术界中着重探讨“勇”的书籍或文章是少之又少，尤其从 19 本书籍中只有一篇论文研究了《论语》中的勇就可发现这情况。我们通过收集的学术论文、期刊论文与书籍可以发现，以往的学术界都较多关注“仁”、“义”与“礼”，一直到近十年才开始越来越多学者着重研究“勇”这课题。

笔者通过自己所收集有关着重探讨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这方面的书籍、学士论文与期刊论文发现，在论文中将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有 4 篇，但其中三篇都不只是在探讨《论语》的“勇”，他们还将其他人物或经书来相比较，真正只针对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一篇论文；而书籍中只有一本论文集里有收录了一篇有关《论语》中“勇”的研究，因而笔者认为学术界中对于《论语》的“勇”的研究还可更深入，尤其笔者认为“勇”应该还要秉持中庸之道，但大部分学者都没提出这论点，因此笔者将在论文中进一步论述秉持中庸之道的“勇”究竟是什么。此外，大部分学者都没有讨论“勇”的修养方法，只是在探讨“勇”的内涵与类别，但笔者认为“勇”的修养方法也很重要，学习“勇”的修养方法才能将它用在生活上，因此也会在论文中论述“勇”的修养方法。

(三) 研究方法

自己在撰写“勇”的修养方法时，以 PDCA 循环作为参考对象，因为它带给了自己启发。PDCA 循环就是计划(Plan)、执行(Do)、检讨(Check)和调整(Action)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，而这让笔者想到在《论语》中也有相似的方法，它与孔子提出的论述不谋而合，因而 PDCA 循环给予了自己有益的参照与思考。除此之外，在撰写的过程自己也使用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分别为：

1. 文献研究法

文献研究法是需要获得原始文献，搜集、鉴别和整理文献，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将以此作为研究基础或分析目标的研究方法。笔者将会尽力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，将其进行分类与整理，然后根据自己论文写作的需求来进行筛选，并且通过参考所整理的文献，来进一步探讨与分析究竟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与其他儒家思想者的异同点在哪，让自己可以对《论语》的“勇”有更全面的认识。

2. 比较研究法

比较研究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，将对物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性进行对比，并且探究它们之间的规律的研究方法。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，笔者将通过对于《论语》中“勇”的类别进行比较，并且探讨这几种类别的“勇”之间拥有什么关系，使论文内容能更有系统且全面地论述要点。

二、“勇”的基础与类别

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者，在儒家经典中可多次他认为的道德标准：仁，这可透过《论语》中“仁”这字出现的次数即 109 次来证明，而“仁”又必须透过其它方式来表现。那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可说是“勇德”，在书中被提了 16 次。“勇”的意思可以说是勇敢、敢为、无所畏惧，它也是君子必须有的德性之一，那“勇”与“仁”之间又有什么关系？在这一章节里，笔者将会探讨“勇”与“仁”之间的关系，由于“勇”和“义”在《论语》中经常被相提并论，例如：“见义勇为，无勇也”、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”等等的，由此看出它们有较为明确的关系；相反的，“仁”与“勇”在《论语》中的关系除了可通过“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”发现之外，其他方面都较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因此在第一节中将通过“勇”与“义”、“义”与“仁”的关系来进一步证明“勇”的基础就是“仁”。此外，笔者认为“勇”又必须受“礼”的约束，这是因为《论语》中有说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”，证明“礼”与“义”是相辅相成的，而“义”又与“勇”有关，因此可认为“勇”与“礼”也具有密切的关系。“勇”也需要合乎中道，因此将在第三节提出中道对“勇”的重要性。若“勇”若缺乏礼仪与中道将演变成“无德之勇”，逐渐偏离孔子所推崇的“勇”，因而将在第四节中通过各种例子描述何谓“无德之勇”以及其带来的影响。

（一）“勇”的基础

在开始说明勇的基础是什么之前，我们先来讨论“义”这字的意思。一般上我们都认为“义”的意思是公正合宜的道理，或是合乎正义的事情。那在《说文解字》里，“义”的意思为“己之威仪也。从我、从羊。”（许慎，2007：1099）根据《说文解字注》对这段文字的解释是：“威仪出于己、故从我。董子曰：仁者，人也。义者，我也。谓仁必及人，义必由中断制也。从羊者、与善美同意。”（许慎，2007：1100）从这我们可以将“义”解释为它与“善”是同意，且它是“我”必须做的正确合宜的事情，即为“义”。《论语·里仁》中有一章句对“义”解释得很透彻，那就是“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”（朱熹，2017:70），也就是说君子对天下的事情，并没有规定要怎么做或不要怎么做，只要合乎“义”即做的恰当合宜，就可以了。

那“勇”与“义”又有何关系？我们先来看《论语·宪问》所记载的：

陈成子弑简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。”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‘告夫三子者。’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（朱熹，2017:145）

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权臣陈桓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杀了，对孔子来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从《论语·先进》中就可看出。在该篇中孔子曾说具备相当才能的臣子，是不会“弑父与君”，因为这就违反了君臣之义。（朱熹，2017:122）因此当

时的孔子虽然已经没担任官职，但一听说此事便决定告诉鲁哀公，让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桓。孔子虽不再担任官职，却仍然“不敢不告”国君，表现出了他对此事不敢丝毫怠慢。这份勇气又是从何而来？那就是因为“义”，前文已说明只要做事合乎“义”，就可以去做。孔子会勇于将此事禀告国君，正是因为对他来说，将臣弑君此事禀告国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因而触发了他的勇气。由此可见“义”的重要性，而合乎“义”的勇，也就是“义理之勇”，才是孔子所推崇的勇德。

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孔子曾说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”（朱熹，2017:153），这句话可以解释为：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，而是勇于牺牲自己来达到仁，也就是“舍生取义”以达到“仁”。《礼记·礼运》提到：“仁者，义之本也，顺之体也，得之者尊。”（王文锦，2005:305）也就是说“仁”是“义”的根本；孟子则说：“仁，人心也；义，人路也”（朱熹，2017:312），他认为“仁”是人的良心，“义”是人的正路。将上面两个句子的意思结合起来，可以解释为：人所走的正路或所做的事情，必须依靠良心，以良心为根本，也就是“义”以“仁”为根本，才是孔子所认为的“义”。

在之前曾提过：合乎“义”的“勇”，也就是“义理之勇”，才是孔子所推崇的勇德；而“义”又必须以“仁”为根本，才是孔子认为的“义”。其中孔子曾说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”，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里的解释是：仁者，心无私累，见义必为。勇者，或血气之强而已。（朱熹，2017：140）从这里我们可以认为，心中有“仁”之人，必定是见义勇为之人，否则有“勇”，心却无“仁”与“义”，就只是血气方刚、鲁莽行事而已，这就有别于孔子所认为正确的“勇”。因此根据“勇”、“义”、“仁”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总结出孔子所认为的“勇”，它的根本就是“仁”。

（二）礼义之勇

在上一节已经提到，“勇”必须合乎“义”才是孔子认为的“勇”，而“勇”的基础就是“仁”，但“勇”的内涵具有“仁”与“义”就够了吗？其实并不是如此，而是还需要有“礼”。首先我们来探讨《论语》中对于“礼”的论述，孔子曾感叹地说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（朱熹，2017:166）表示外在的玉帛相赠，并不是“礼”的重要内涵。甚至在《论语·八佾》有记载孔子对“礼”的论述：林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也，宁戚。”（朱熹，2017:62）从这两者的论述可知，孔子认为“礼”重要的不在形式，而是贯彻其内的内涵与精神。

“礼”的内涵和精神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“仁”与“义”，关于“义”与“礼”的关系，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有明确说明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”（朱熹，2017:155）。这表示“义”是“礼”的本质，“礼”是“义”的表现，也就是说一切生活秩序、制度、礼仪等都是以“正当性”——“义”为基础。孔子认为人们在生活上的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，都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，但这种“应该”、“正当性”又要如何界定呢？这又会回到上一节所提到的：若“仁”表示人的本心、道德本体，“义”代表正确的事情，也就是说只要根据人的本心去做，就会做出正确的事情，也就是“义”以“仁”为基础，而此时也可发现“礼”又与“仁”有关系。

“仁”与“礼”的关系，在《论语·八佾》中有明确的论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朱熹，2017: 62）他在此句中强调了外在的礼乐制度，若没有以“仁”精神基础，那礼乐制度就只是外表形式，而没有其重要的

价值。所以，“仁”才是最重要的内涵，而“礼”只是“仁”外在形式的体现。此外，“仁”与“礼”又有里外相依的关系，孔子认为“仁”是作为“礼”的根本，但反过来说人的内在本心又必须靠外在的礼乐制度来表现，正如《论语·颜渊》所论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朱熹，2017:125），只有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且遵循礼乐制度的规范，才能复归到“礼”的根本——“仁”。《论语·八佾》里有一章句证明了“礼”必须以“仁”和“义”为基础，子夏问曰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何为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诗矣”（朱熹，2017:63）。在这里可看出，孔子认为子游说的“礼后乎”正符合他所说的“绘事后素”，也就是孔子认同子游的想法，他也认为必须先有“仁”和“义”且“礼”跟随其后，才能表现出真正的“礼”的本质。

正如一开始所说的，勇有“仁”与“义”还不够，还必须受“礼”所约束。一来受“礼”所约束的“勇”，能帮助人更好地成就“义”和“仁”；二来受“礼”所约束的“勇”，才是《论语》中真正提倡的勇德。为何说受“礼”约束的“勇”才是《论语》所提倡的？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证明。“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”（朱熹，2017：169）。孔子虽然没有说他为何“恶勇而无礼者”，但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孔子提倡的勇德，其内涵必须以“礼”贯之才是对的。孔子亦曾说“礼”对“勇”的重要性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蒺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”（朱熹，2017：99）。在这里我们可发现，“礼”的重要性就在于可以约束自己，避免因为自己的“不惧”而捣乱闯祸。其中“勇而无礼则乱”正表现出了这含义，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“勇”却不懂“礼”，那便只是逞血气方刚之强而

己，而且一个大胆敢为却不受礼制约束的人，在处事上很容易鲁莽行事。我们可以透过子路这人物来更了解这种现象：

“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，……子路率尔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……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。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（朱熹，2017：123-134）

孔子对子路的志向似乎并没反对，但他“哂由也”的原因就在于子路说话毫不谦虚，因为子路自夸自己治国三年，便可让人民人人有勇气而且明白道理。可是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让，但子路却毫不犹豫第一个发表他的看法，正是其不受“礼”的约束，促使他说话毫不谦让。从中可知“礼”对“勇”的作用极其重要，“礼”可以约束“勇”的行为，从而让自己走向正确的道路，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“勇”是“礼义之勇”，而非“血气方刚之勇”。

（三）中道之勇

在上一节中有提出，“礼义之勇”才是君子本身应该具备的勇德，但依靠“礼”的约束就可以成就“仁”与“义”了吗？“礼”的约束又该如何掌握分寸？这时就需要中道的帮助，也就是“中庸之道”。朱熹对“中庸”二字的解释为：中者，

不偏不倚、无过不及之名；庸，平常也。程颐则解为：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（朱熹，2017：19），而中庸就是“适量守度”的意思，也就是适度、合乎中道的方法，简单来说就是无过与不及。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（朱熹，2017:120）从这里可知任何事物都有其必须达到的“度”，超过“度”就是“过”，达不到就是“不及”，“过犹不及”都是不好的。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（朱熹，2017：86）。“质”的意思可解释成“本质”、“本心”，也就是内在的仁德；“文”即文采，可将其解释为“礼”，只有具备“仁”的内在修养，同时合乎“礼”地表现方能成为“君子”。“质”与“文”的关系正如“仁”与“礼”的关系，而这里体现出了中庸思想：不主张质胜于文，也不主张文胜于质，因此中庸也是达到“仁”之最高境界的方法。

《论语》虽然从未明确指出合乎中道的“勇”，是孔子所提倡的，但我们可以通过《论语》中的一些例子来证明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（朱熹，2017:79）在这里可看出，孔子似乎觉得季文子过于谨慎因而缺乏了勇气，所以孔子劝季文子在做事时要大胆、勇敢一些。难道孔子不认同做事情要“三思而行”吗？其实并非如此，季文子向来行事以谨小慎微著名，据《左传》的记载：秋，季文子将聘于晋，使求遭丧之礼以行。其人曰：“将焉用之？”文子曰：“备豫不虞，古之善教也。求而无之，实难。过求，何害？”（杨伯峻，2000：549-550）从这可看出凡事都要做到有备无患是季文子的性格特征，因此孔子才会认为季文子过于小心而劝他。

子路好勇的性格，却是正好与季文子相反，因而不被孔子所认同。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曰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”（朱熹，2017:92）。子路好勇直率的性格，促使他看见孔子称赞颜渊而问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，他认为孔子率军必定会因自己的好勇而选择一起共事。孔子也似乎看出子路的心思，因而回答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”，这不说明了孔子在婉转告诉子路，他内心的“勇”已超过“度”了吗？子路在《论语·先进》也体现了他的“过度之勇”。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……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”（朱熹，2017:121）。子路勇于作为的性格，让孔子因而劝他必须要三思才行。季文子的“勇”不正是显现了“不及之勇”，而子路则是“过度之勇”吗？由此可看出，孔子认为“勇”也必须合乎中道，否则都是不好的。

中庸是孔子所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，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，过犹不及，并且要求人们准确把握“度”，但这些分寸却是如此难以掌握，因此孔子才会感叹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”（朱熹，2017:88）。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，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当我们难以达到中道的时候，可以学习孔子所说的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”（朱熹，2017:138）去结交狂狷，因为真正能做到中庸之道的人不多。“狂”可解释为激进者，“狷”可解释为拘谨自守的人，狂者一意向前，狷者清高自守，不敢做坏事，因此与他们相交可以互补自己的不足，从而让自己更易接近“中道之勇”。

(四) 无德之勇

根据前文所讨论的《论语》中对“勇”的叙述，可知孔子所推崇的“勇”是以“仁”为基础，见义而为又必须受“礼”的约束，并且它要合乎中道。若缺少了其中一项，就会出现“乱”的现象。子路曰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；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”（朱熹，2017：169）。这里的“君子”是表示上位者的意思，孔子认为君子之“勇”，必须以义理为上，若君子无“义”就不会分辨是非善恶，光有“勇”而不讲道义，最后因为自己有权有势、有勇无义而出现捣乱造反，小人则会因而抢劫，使社会出现混乱。此外，孔子说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60）。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孔子对臣子所说的，因为如以上所说的，若君子“有勇而无义”就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秩序，这时候身为臣子的就应该勇于进谏，不能怕丢官而选择缩头隐身，因而成为德之贼，并且也会让自己变成引发国家暴乱的帮凶之一。孔子也曾说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；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101），这里可以将其解释为孔子对老百姓的看法，孔子为何说“好勇疾贫，乱也”？这是因为当时的老百姓经常遭受权贵者的压迫和欺负，生活非常贫穷困苦。如果大部分百姓是懦弱之人，他们就只会忍气吞声，接受权贵者的剥削；但如果这时百姓中出现一个勇敢的人，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反抗，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天下就不能太平。

“无德之勇”除了会让社会动荡不安外，它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表现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”（朱熹，2017：161），人在壮年时，

容易因为血气旺盛而好勇斗狠。血气方刚之人，除了喜爱好勇斗狠他们也很容易冲动行事，因此其性情较急躁易怒。这种人在言语方面容易犯下过错，正如孔子所说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”（朱熹，2017：160）。“言未及之而言”即不到该讲的时候就讲出来了，这叫做“躁”，正是因为血气方刚，容易心浮气躁，缺乏耐性。这不就好像子路吗？孔子对子路的评价是“行行如也”（朱熹，2017:119），从这里可看出子路的性格特征是好勇、直率刚强，但也因此他的性情也较为急躁，在《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篇》中可看出，他在孔子说完话后就选择第一个直接发言，这不正表现出好勇刚强之人，其性情也较为急躁吗？但孔子也曾说：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”（朱熹，2017:76），他认为子路好勇却不善于取舍裁决。正因如此，孔子担心子路的未来而感叹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”（朱熹，2017:119），而确实子路最终的下场很不好。当时卫国政变，卫出公势败，子羔曾奉劝子路离开，但子路那勇于作为却不善于审时度势的性格，让他坚持入城阻止孔悝与蒧聩，最终子路被剁成肉酱。因此若子路若懂得审时度势，或许他就不会受子羔的劝告后仍鲁莽行事选择入城，而让自己落入如此可悲的下场。

三、“勇”的修养方法

根据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内容，说明了“勇”必须具备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，并且合乎中道，它们对“勇”而言是极其重要，否则就会出现“乱”的现象。那我们又要如何将这勇德实现在自己的生活上呢？因此，我们将在这一章着重探讨关于“勇”的修养方法。为了朝着孔子提倡的“勇”前进，最终达至“仁”的最高境界，我们将分别论述“勇”的修养方法。笔者试图以 PDCA 循环¹作为基础，进一步提出“勇”的修养方法。P 计划(Plan)也就是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，制定执行的计划；D 执行(Do)则是将计划实践出来；C 检讨(Check)也就是检查执行计划的结果的好坏；A 调整(Action)是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，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，对于失败的教训也要引起重视。（章围国，2015：6-7）PDCA 循环所提出的理论，其实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相似的想法了，《论语·述而》中曾记载：“子以四教：文，行，忠，信”（朱熹，2017:95），“文”也就是读历代文献，而 P(Plan)是制定之后要执行的计划，要制定执行“勇”的修养的计划，不正是要通过阅读才能策划吗？“行”也就是实践，这不正与 D(Do)一样的意思吗？此外，C(Check)也可以说是反省，A(Action)是对结果进行处理，也可说是改过自新，而反省和改过很早前在《论语》里就有提到，如“三省吾身”和“过则勿惮改”都是说明反

¹ PDCA 循环是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(Deming)提出，故又称“戴明环”。PDCA 循环通过计划(Plan)、执行(Do)、检讨(Check)和调整(Action)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，一个循环结束，解决一些问题，未解决的问题进入下一次循环，从而形成一个螺旋上升阶梯式持续改进的循环模式。（章围国，2015：1-2）PDCA 不但可以用于任何一个组织管理，在自身的学习上也可以使用。根据“2012 年华文独中董事校长交流会”上各校老师提出的意见，他们认为 PDCA 有助于学生的成长，并且也发现部分学生因为使用了 PDCA 循环，从而开始表现出自学、自觉、自律的学习态度，因此可总结为 PDCA 也可用于自身的修养。（林昌平，2013:16）

省和改过。由此可看出两者所提出的内容是不谋而合，甚至在孔子时代已经提出了。因此，笔者根据 PDCA 循环所提出的方法，甚至参考了《论语》中所论述的修养方式，进一步提出“勇”的修养方法为：好学、力行、内省、改过。

（一）好学

在《论语·述而》中有这么一章：“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”（朱熹，2017：165-166），“仁”、“知”、“信”、“直”、“勇”与“刚”这六个方面是道德，都是好的；可是因为不好学，就会让自己走偏了，失了中道而产生弊病。通过学习，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才能符合“仁”、“义”，让自己找回“仁义之心”的方法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学习是多么的重要。因此，好学是作为“勇”之修养方法的第一步。我们将《论语》中关于孔子对学习的看法概括为两点：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方法。

首先我们先讨论孔子认为学习应具有的态度。他认为，追求学问的态度首先在于爱学、乐学。孔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（朱熹，2017:86），这是因为只有爱学习、为学习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。要达到乐学这一境界，那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兴趣，也就是努力培养自己对知识的积极追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充分让自己积极学习，使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产生较高的求知欲。此外，孔子也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但要勇于坚持到底，因为他曾对冉有说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，今女汝画”（朱熹，2017:85），也就是说

他认为冉有不是能力不足，若能力不足那就会在中途停顿，可是冉有现在以能力不够来限制自己，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到底的原因。再者，孔子也提倡要做学问要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”（朱熹，2017:78），而他也曾对子路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59），也就是在提醒子路要虚心学习，不要不懂装懂，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虚心学习、不耻下问的态度，才能学得更多。

另外，在《论语》中也记载了许多孔子提出的学习方法，如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（朱熹，2017：58），正是强调学了之后必须经常复习，从中获得新的知识或理解，就能做他人的老师了，否则学了不复习很快就会忘，那就没意义了。孔子也很重视学思并重，这是因为他通过自身体验，而逐渐明白开始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。这从何见得？因为他曾说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；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，正是通过自身体验才开始注意学思相结合的重要性。他亦曾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（朱熹，2017：58），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感到迷茫，孟子亦曾说：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（朱熹，2017:341），就是在说身为读者要善于独立思考，不要只是拘泥于树上的知识；相反地，只一味思考却不学习，则会因为知识的匮乏而一无所得。因此从中可知，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，才能真正学到知识。

（二）力行

孔子曾说：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（朱熹，2017：95），《中庸》亦曾记载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（朱熹，2017：32），这两句都说明了学了之后就要实践。而在前文中有提出，好学是“勇”的修养方法的第一步，孔子又说学了知识后就一定要去实践，因此通过以上提出的论述，间接说明了“勇”的修养方法的第二步就是力行。当我们掌握了知识之后，就应该要将它实践在自己的生活上，正如孔子说的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（朱熹，2017：135）也就是说，一个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的人，交给他政治任务，却办不好；让他出使到国外，又无法独立做主应对；这样的人虽书读得多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由此可见，学习不在于死记书本内容，而是在于学以致用。只有通过实践，才能更清楚明白“勇”的具体表现应该要怎么做才对，毕竟理论与现实还是有差别的。孔子也曾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（朱熹，2017：49），这句话是说将之前学到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中，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？这不证明了只有将学到的知识加以实践，才是真正修养的方法吗？

当然在力行的过程中，要注意避免自己犯下一些过失，如总是将大道理挂在嘴边，真正实践的时间却很少。孔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（朱熹，2017：146）也就是说君子觉得可耻的是说得多，做得少。他也曾说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（朱熹，2017：73），也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要谨慎，并且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（朱熹，2017：58），做了以后才说出自己做过的事情，人家才会

被自己信服。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避免犯下这种过错，要少说多做，才可以将真正的“勇”实践于生活上。此外，我们也可学习子路对于力行的方法，即：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又闻”（朱熹，2017：78），当我们在一个时间段集中学了一个方向后，就要将其加以运用、执行，确保自己完全掌握了知识，才再继续学新的知识，否则到最后，自己将无法学得扎实，并且也无法将学到的知识完全应用在上生活上，这就变成事倍功半了。

此外，我们也要确保在力行的时候是符合正道的，因为《中庸》里也有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；可离，非道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19），也就是要让自己在力行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正道。要确保自己在力行的过程中，每一刻都不会离开正道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需要有自我约束力、自我监督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就是“慎独”。正如《中庸》说：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现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（朱熹，2017：20）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更是要小心谨慎，因为往往从最隐蔽、最细微的言行上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。因此在力行的过程中，无论是人前人后都要时时问自己是否有愧对良心，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偏离正道。

（三）内省

我们在力行“勇”的过程，难免会出现做得不对或不够好的情况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反省自我，来让自己变得更好、更进步。孔子曾说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81），孔子说他没有见过会为自己

的过错而真正内心责备自己的人，他实际上是从反面来强调内省的重要性。孔子其实认为内省是提高修养的方法，因此可知内省也是个人修养中很重要的一环，对于“勇”的修养来说内省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可通过张飞的例子来证明。根据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的记载，张飞是“雄壮威猛”的一个人，且他崇敬有才能的名人而对部下十分粗暴。刘备曾告诫他这种做法会引起祸端，但张飞没听取劝告也没反省，最终张飞被其手下将领张达和范疆给杀害。（陈寿，2006:563）由此看出，有“勇”之人也必须懂得反省，且还要听取他人对自己的劝谏，否则容易带给自己麻烦。

我们可以将内省分为两个层面，第一种是通过对自身行为的反省。曾参身为孔子的弟子之一，就是做到了对自身行为的反省，他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（朱熹，2017：50）。他每天都在反省自己，为人办事是否不忠？与朋友相来往是否守信用？是否有经常复习老师传授的知识？孔子对曾参的评价是他较为迟钝，但这样一位愚拙的人却被后世尊为“宗圣”，原因何在？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：“三省吾身”，也就是他经常自我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才让他因此变得更精进。

关于内省的另一个层面，则是通过观察别人的恶性，来达到反省并且警惕自己，不要犯下那种过失。这就如孔子说的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72），看见贤人就要向他看齐，看见不贤的人就要自我反省，是否有跟他一样的问题或毛病？孔子亦曾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（朱熹，2017：95），几个人走在一起，其中一定有能作为我老师的人；选他的优点来学习，看见对方的缺点就自我反省，然后改掉它。从这里可发现，观察别人的行为，从而反省自身行为的过失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内

省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实践的过程没有什么过失，甚至会觉得自己做得对。可是通过观察别人，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力行的时候，是否犯了一些毛病，但自己却不自知的，通过这方法来反省自己，也可以借着别人的行为带来的影响，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。

其实自我反省了还不足够，还要让自己的心达到“不疚”。反省自我很多人可以达到，但要让自己的心达到“不疚”就不容易了。要达到“不疚”，就要确保自己的日常行为都无愧于心，而要让自己日常行为无愧于心的方法，就是做任何事都需小心谨慎。此外，要让自己达到“不疚”的境界的前提是，要常常自我反省。通过自我反省才能更认识自己的过失，从而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行为，最终达到无愧于心。让自己的心达到“不疚”，也就是无愧于心，就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做任何事情都能无所畏惧，就如孔子说的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（朱熹，2017：127），从而达到“勇者不惧”了。

（四）改过

改过，就是改正过失或错误。通过自我反省，可以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；知道自己的过错后还懂得去改正，就是一种“勇”的表现。《中庸》里有说：“知耻近乎勇”（朱熹，2017：30），意思就是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，而知耻并勇于改过，更是值得赞赏的行为。《论语·子罕》里有一句：“过则勿惮改”（朱熹，2017：109），有了过错，就不要害怕去改正，朱熹也为此注释：自治不勇，则恶日长，故有过则当速改，不可畏难而苟安也。（朱熹，2017：109）他说明

了我们不可因害怕困难，而选择了苟且偷生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中曾记载晋灵公无道，滥杀无辜，他的臣子进谏，晋灵公立即表示他知错，一定要改过。（杨伯峻，2000:657）晋灵公那反省自我，懂得认知自己的错误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庸》所说的可算是“勇”的表现，可惜他言而无信，选择苟且偷生，最终被其臣下所杀害。这是因为不改过，会让自己的恶行越来越严重，或是让自己处于同一过错一犯再犯的情况，就像晋灵公一样。由此看出“勇”的修养中，改过也是很重要的，只懂得勇于承认过错却不改过可是不可行的。若等到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了，才愿意去改过就太迟了，而且比起一过即改，其难度自然变得更加艰难。

改过其实就是在积极纠正自己行为，我们要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“闻过则喜”，只有通过不断改正，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。其实我们在力行的过程或许会犯错，但犯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知错而不改，那就是一种过错，正如孔子说的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”（朱熹，2017：156）。《左传》上也记载：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”（杨伯峻，2000:657），犯了错还能够认识并改正错误，就是最好的事情，由此看出古人都认为改过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可以通过《论语·子张》进一步证明孔子也非常重视改正错误，认为改过是修身的重要方面之一。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”（朱熹，2017：178），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被人看的很清楚：他犯了过错，人们都看得见；当他改正了错误，人人都会仰望他。孔子自己也曾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”（朱熹，2017：90），自己的品德不去培养，遇到缺点不去改正，都是让他感到担忧的事情，更何况我们呢？相反的，如果自己知错不改，甚至还加以掩饰，那就变成了小人，因为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”（朱熹，2017：176），这样的

话只会让自己为人所不齿而已。由此看出，改过真的很重要，不断改过才能让自己具有高尚品德，更像是“正人君子”的人，从而成为被人赞扬、景仰的对象。
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最重要的是懂得去悔改，我们可以效法颜渊的行为。孔子曾说颜渊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（朱熹，2017：82），遇到过错不逃避不转嫁，选择勇敢面对它，甚至知错能改，不让自己重蹈覆辙，这是很难得却又值得赞赏的行为，也因为颜渊如此的行为，因而获得了孔子对其很高的评价。由此看出，孔子的确也认为人要改过，改过也是自身修养的功课。历史上除了颜渊，也有其他人因为及时改过而成就自己，如楚庄王。根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楚庄王初登基时，终日沉浸酒色，不理朝政。后来他的臣子伍举以“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”来启发他，甚至另一臣子苏从以死劝谏，最终楚庄王愿意反省改过，认真处理朝政，使楚国变得强大起来，而他自己也成为了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（司马迁，2014:2051）由此看出，过而能改的人，其修为必定如日中天，进步很快如颜渊和楚庄王，因此我们在反省后就要懂得去悔改、改过。当我们改过之后，再回到第一节所说的：好学，通过学习让自己获得新知识，定下一个新目标，从而让自己在“勇”的修养方面变得越来越进步、越来越好。

四、结论

本文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论述，初步完成了对《论语》中对于“勇”的看法和修养方法。我们可以通过《论语》发现，孔子认为真正的勇德不但需要无惧的心理，而且这“勇”还必须要符合礼制、义理和仁心，缺少一个都不是君子该具有的勇德。此外，“勇”还必须符合中庸之道，太多太少都不好，失去平衡就会让身边的人或社会变得混乱。以上说的都是理论，我们可以尝试用社会新闻来看是否真是如孔子所说的。

今年2月21日在中国福州就发生了一起“赵宇见义勇为后反被拘”的案件。这事件引起网上许多人的讨论，原因在于年轻男子赵宇，为了施救被性侵的女子而出手打伤了施暴者，结果施暴者因伤重住院，但没被警方扣留，反倒是赵宇因自卫而失手伤人遭到逮捕。许多网民认为警方做得不对，应该赞赏赵宇的行为，而不是因为打伤施暴者而被囚禁十四天。我们只针对赵宇的行为来看，他遇到一位女子被人性侵，毫不犹豫地救下她，这的确是很好的行为，他的确符合孔子说的“见义勇为”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为了自卫结果失手伤人而被逮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或许就是因为他的“勇”虽然符合“义”，但他没掌握好那尺度，所以导致他过于勇猛而失手伤人。在事情发生的当下，或许会很难控制那尺度，但这不正表示勇德也是必须要靠平常的修养才能建立起来的吗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本文里会提到“勇”的修养方法的原因。或许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较为勇猛、大胆，但不去好好修炼它，只会变得鲁莽、冲动行事而伤害了自己或身边的人。

修养的功夫的确不是一夕一朝就可以练成的，但只有坚持下去，才能确保自己无时无刻都能在勇于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不会为了自己的敢为而带来严重的后果。

由于笔者才疏学浅，所以可能存在对《论语》或其他儒家经典的理解或解读不到位的情况，致使在撰写的过程中或许会有些遗漏，而使研究达不到好的效果。可是笔者仍希望，这篇研究能带给自己或身边的人一些影响，让大家明白勇德的重要性，甚至将其实践在生活上，这也是这份研究被撰写的原因之一。笔者愿意不断学习，提高知识与学问，以期能够为学术界带来更深入的研究，甚至让自己或身边的人都能因此逐渐朝着圣人的脚步前进，品德修养变得越来越好。有志于此，心诚求之，虽不中亦不远矣。

引用书目

（一）书籍

1. 陈寿（2006），《三国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2. 林昌平（2012），《2012年全国华文独中董事校长交流会：资料汇编》，加影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。
3. 司马迁（2014），《史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4. 王文锦（2005），《礼记译解》（上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5. 许慎（2007），《说文解字注》（下册）（许惟贤整理）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。
6. 杨伯峻编著（2000），《春秋左传注》（第二册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7. 朱熹（2017）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。

（二）期刊论文

1. 曹圆杰（2018），〈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字的用法考察〉，《海峡教育研究》，2018年第2期，页33-38。
2. 黄建跃（2011），〈“好勇过义”——兼论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及其限度〉，《孔子研究》，2011年第5期，页82-90。

3. 李振纲 (2012), <《论语》中的“勇”与子路“好勇”>, 《河北学刊》, 2012年1月第1期, 页30-33。
4. 刘彤 (2009), <析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的“勇”的内涵>, 《语文学刊》, 2009年第9期, 页108-109。
5. 潘小慧 (2007), <儒家哲学中的“勇德”思想>, 《哲学与文化》, 2007年1月第34期, 页119-132。
6. 涂可国 (2017), <儒家勇论与血性人格>, 《理论学刊》, 2017年7月第4期, 页90-101。

(三) 学位论文

1. 冯婕 (2012), 《<论语>君子三达德思想研究》, 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, 河北大学, 河北。
2. 吴兵兵 (2016), 《先秦儒家三达德研究》, 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, 重庆师范大学, 重庆。
3. 尹春光 (2014), 《先秦儒家勇德研究》, 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, 曲阜师范大学, 山东。
4. 章围国 (2015), 《PDCA循环模式在高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》, 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, 南昌大学, 南昌。